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high-angle view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urtyard with a red wall and a dark sky with multiple bright lightning bolts striking down. The title and subtitle are overlai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.

动乱中的中国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局

China in
Convulsion

Arthur Henderson Smith

[美国] 阿瑟·亨德森·史密斯 (明恩溥) —— 著 桑紫林 ——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动乱中的中国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局

[美国] 阿瑟·亨德森·史密斯（明恩溥） 著

桑紫林 主译、校对 赵娟 朱伟斌 参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动乱中的中国: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局/
(美)阿瑟·亨德森·史密斯著;桑紫林译.--上海: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19

ISBN 978-7-5520-2547-7

I. ①动… II. ①阿… ②桑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清
后期 IV. ①K2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82894 号

动乱中的中国: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局

著 者:(美)阿瑟·亨德森·史密斯(明恩溥)

译 者:桑紫林

责任编辑:路 晓

封面设计:夏艺堂艺术设计

出版发行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sassp@sass.org.cn

照 排: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23

字 数:456 千字

版 次: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2547-7/K·489

定价:8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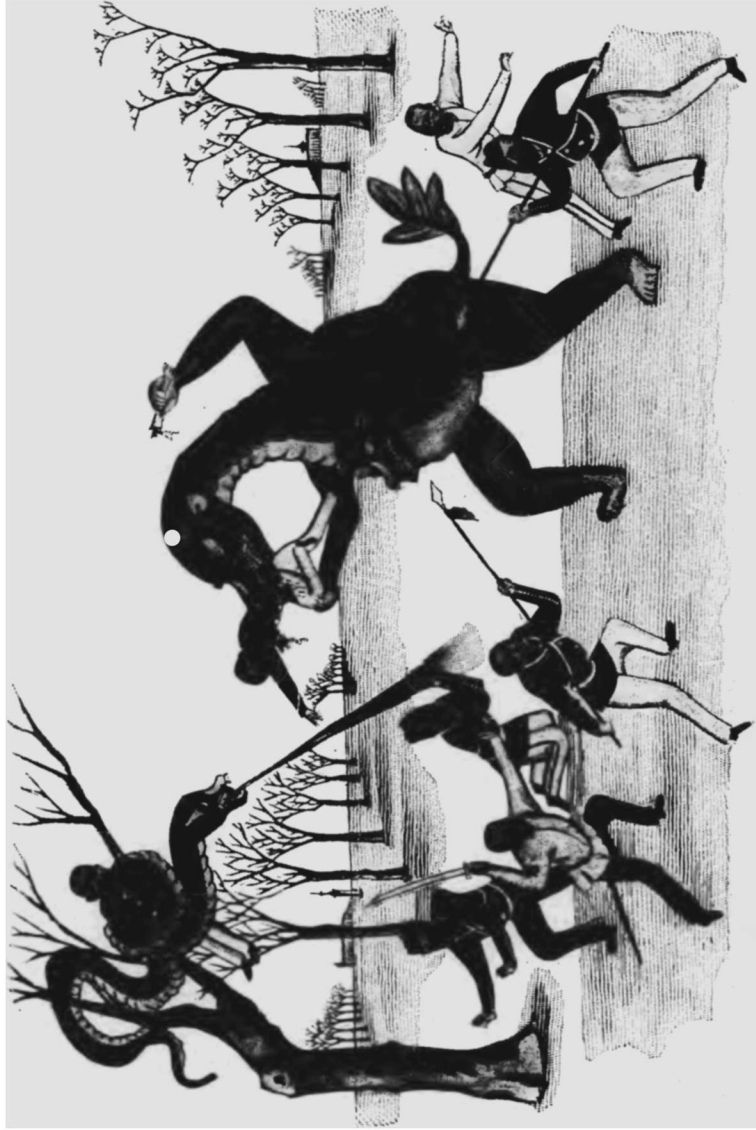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说明

明恩溥(Arthur Henderson Smith, 1845—1932),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,1872年来华,初在天津,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,兼任上海《字林西报》通讯员。明恩溥在鲁西北传教30年,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,包括《中国文明》《中国人的性格》《中国乡村生活》《动乱中的中国: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局》《王者基督:中国研究纲要》《中国的进步》《今日的中国与美国》等。其中,《动乱中的中国: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局》详细记载了义和团的兴起、发展、高潮,特别是“杀戮洋人”的过程,以及清王朝的对策,涉及北京、天津、通州、大沽口、陕西等地的“灭洋”事件。该书是研究义和团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,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。

《动乱中的中国: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局》对中国近代史及中国社会的研究,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西方学者的中国观。虽然有的分析很透彻,有的评价很到位,但其立场是站在西方侵略者一边,书稿中将近代中外矛盾的产生归咎于中国,包括中国官员的傲慢无礼、刚愎自用,中国百姓的愚昧无知等,基于忠实原著的原则,我们保留了原作的视角,但仅能代表当时作者的个人观点。

因此,本书可以作为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参考书,但我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它。



义和团海报

满清皇宮中發現的原圖，描述了中國人眼中的洋人及其與華關係。

前言

十九世纪末，中国爆发了抗击外敌的运动，并引发了动乱，其根本原因只能从遥远的过去寻找。人间世事如此，中国人的行事更是如此。如若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，便无从理解这一历史事件。

当民众公然进攻位于国都的十一国公使馆，这一运动立刻变成国际事件，其本质顿时一览无余——中国蓄意与西方列强为敌。诸多国家迅速对此予以关注，怀揣着莫大的兴致，密切注意该事件的进展。

据传，7月7日当天，义和团拳民在英国公使馆公然屠杀，所披露的细节耸人听闻。随后，民众在圣保罗大教堂为逝者举行了盛大的弥撒，更多主要事实逐渐为人所知，世界各国开始对此予以关注。这一动乱，有别于古今中外所有大的历史事件，因为其情节蹊跷微妙、范围广阔、影响深远，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兴趣。这一切恰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：没有做不到的事，只有想不到的事。可以预见，人们会持续关注这一事件，也定会有人综合各家之言，对其进行全面调查，还原历史真相。有朝一日，如果有人研习历史，便能有据可依了。

动乱中的许多重要事件，尤其是中国政府的举动，目前尚无从得知。因此，在这一方面，观点存在分歧在所难免。

本书尊重百家之言，同时对北京围困相关事件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述，意在勾勒出整个运动的轮廓，直至其高潮迭起。当然，因为描述面较广，难免有细节遗漏或有失准确之处。同时，由于笔者所知有限，在对部分事件描述时可能有关系梳理不当、有失偏颇之外。

造成这种尴尬情形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官方报告信息。事件涉及多国，但只有英国发布了蓝皮书和白皮书，而其最后一卷又因为发布过晚，其中信息也未能被本书加以运用。军事行动描述颇有必要，但在本书中只是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。这一不足，幸好被来自其他渠道的信息弥补了。

中国动乱这一主题，涉及多个国家，要对其进行全面细致的处理，就要描述运动爆发后一年内的一系列事件，包括和约的缔结和运动的结果。和谈延续数月，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们目前知之甚少。但是很明显，和谈

并没有任何建树,未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,在中国,也全无“最终结局”可言。因此,能参照过去,对现在局势做一勾勒,便是不错的选择了。

透过这一事件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论断,即中国目前需要重塑道德标准,追寻新的道德生活,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议,认识到这一点也至关重要。基督教的传入与普及,已经在填补这一缺憾,并且表明它在适当时机能为这一目标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。在刚刚过去的动乱中,基督教徒们的表现总体来说让人欣慰,也强有力地印证了基督教的博大精深。

在动乱中,一些西方人的所作所为损害了中国基督教的名声,但在动荡消退之时,道义力量势必持续发挥作用,辐射范围更广,影响更为深远。

无论中国政治前景如何,中国始终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世界要和平,过往的错误就要纠正,而且要以全新的视角去考量中国与列强的关系。
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就要了解过去,审视动乱中的中国。本书便抛砖引玉,做一浅薄尝试。

目 录

前言 / 1

第一卷 / 1

- 第一章 轻商排外 / 3
- 第二章 国际局势 / 9
- 第三章 新教受阻 / 17
- 第四章 天主为祸 / 23
- 第五章 全民抗敌 / 31
- 第六章 仇外宣传 / 36
- 第七章 商业入侵 / 41
- 第八章 列强割据 / 47
- 第九章 改革遇阻 / 56
- 第十章 拳民源起 / 67
- 第十一章 初露端倪 / 77
- 第十二章 风起云涌 / 86
- 第十三章 清廷作为 / 95
- 第十四章 围困北京 / 102
- 第十五章 攻打联军 / 113
- 第十六章 围城首周 / 122
- 第十七章 城墙之争 / 136
- 第十八章 黑色时日 / 147
- 第十九章 达成停火 / 159

第二卷 / 173

- 第二十章 围城生活 / 177
- 第二十一章 数日等待 / 185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|-----|
| 第二十二章 | 轮番进攻 | / | 194 |
| 第二十三章 | 广施救济 | / | 202 |
| 第二十四章 | 沿线战事 | / | 210 |
| 第二十五章 | 坚固防御 | / | 224 |
| 第二十六章 | 围城之后 | / | 235 |
| 第二十七章 | 上帝之手 | / | 248 |
| 第二十八章 | 北京之殇 | / | 252 |
| 第二十九章 | 国都换颜 | / | 261 |
| 第三十章 | 废墟通州 | / | 270 |
| 第三十一章 | 天津解围 | / | 277 |
| 第三十二章 | 城内夷人 | / | 287 |
| 第三十三章 | 重要经历 | / | 299 |
| 第三十四章 | 教会之灾 | / | 313 |
| 第三十五章 | 个人陈述 | / | 319 |
| 第三十六章 | 晋中火剑 | / | 337 |
| 第三十七章 | 敌占一载 | / | 342 |
| 第三十八章 | 前景展望 | / | 351 |

译后记 / 354

第一卷

第一章 轻商排外

当今世界，只要发生诸如义和团运动此类的影响深远的突发事件，人们就想要透过表层，找寻事件的本质和原因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迈出下一步，预测事件的未来走向。

中国幅员广阔，外国人纵使穷其时日，也难以真正理解这一国度，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。对于中国刚刚过去的民众起义这一艰深复杂的问题，有人要么错误地诠释，要么避而不谈，更有甚者，在对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企图用寥寥数语对此事件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。诚如柯乐洪(A.R. Colquhoun)先生所言，中国历史深邃久远，人口庞不可及，因此能真正理解这个群体的人是少之又少。撇开其他不论，单就此点，对于那些简易肤浅的诠释，我们要时刻提防。

那么何为中国人？中国人口数量庞大，无与伦比，而且种群单一，居住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板块上。在历史上，中国的民族成分众多，但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融合，汇聚成一体。另外，中国人似乎与外界隔离，过着独立的生活。中国人无疑源于某处，但究其根源，却众说纷纭；中国人的存在可以上溯四千年前乃至远古时代，因此并没有必要在起源问题上纠结争辩。由西进入中国，中国人占据大江大河流域，一直延伸至现在的山西和陕西；现在人们称呼的长江流域被纳入版图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中国人认为，臣服和“驯化”现居住在福建和广东两省的所谓“南蛮”，只是历史之一瞬(大约一千年左右)。

古代中国与古埃及属于同一时代，两国都与周边国家隔绝。但是，隔离埃及的屏障事实上则是其连接外界的纽带。诸多国家穿梭于埃及的地峡地带，埃及历史也因此与同时代其他帝国紧密相连。相反，中国的天然屏障则并不是摆设。向西，是广袤的沙漠；向东，则是无垠的海洋，护卫着疆土。还有绵延的巨大山脉，犹如卫兵般守卫着肥沃的平原。即便如此，它也没能躲过外敌的入侵，但它却躲过了被同时代人类生活的激流所同化的命运。成吉思汗的铁蹄践踏宋朝国土，建立元朝；但是该王朝气促命短，很快消亡了，古老中国却依然如故。北方有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延伸至阿穆尔河流域；西边则是中亚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的名字在汉字中多使用表示“犬”意的偏旁。纵观人类历史，种族荣耀既非全新概念，亦非无足轻重之因素；倘若民族优越感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根基的话，无疑中国人理应骄傲自豪，而且独领风骚，别无他人。然而，这是最为婉约的谄媚，因此也

极为危险。但是，中国人的自豪感并没有因此而有一丝消退。事实上，除了一段短暂的历史，中国人一直怀揣强烈的民族自豪感。而与其国家漫长的历史相比，这一段时间简直不值一提。

同时，还有必要考虑到一点，由于没有明确的现成的术语，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性情。有人认为，一个民族可以在文明开化、教养有加、富于创造和积极上进的同时，并不渴求变更现有条件从而使得现状变得更为理想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人和盎格鲁-撒克逊人几乎无法达成一致。如今，尚无人有能力描绘中国习俗演变的过程，尽管这些习俗无疑是在不断变更发展的。众所周知，人类历史往往由于先前诸多原因，按照某种不可避免的顺序而不断发展。这一过程能充分体现民众的自由意愿和种种偏好，中国习俗的演变发展也并不例外。

中国人曾经一度踏上发展之路，却一再裹足不前。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一个由来已久的谜团，西方人坚持要洞察其中缘由。对中国人而言，其中根本无谜团可言，因此也无须赘述其中原因。韦兰校长(President Wayland)曾经对一个班级的男孩子们说过一句精妙之言：“一件事如果业已做到极致，你便无法做得更好。”倘若韦兰博士先于中国众多先贤发出此言，那么这便是对植根于中国国民意识的先决条件最为精当的描述。

说到这儿，我要谈谈中国人的理想。他们虽没有上帝的教化，却凭借自身的智慧，创造出了最为崇高的道德准则。这些凝练的教义已经成为宝贵的遗产，由古至今，代代相传。中国历代文人对此深信不疑，认为这些准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完美体系，体现了人的最高智慧。如果感觉等同思想的话，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持有同样观点。文人墨客的感觉因思考而生，下里巴人因无思考而生此感觉，但与前者一致，而且当触及它们的本原时，常常这种感觉也同样强烈。或许，中国之外，这种现象难觅踪迹；然而，中国之内，这一概括可能普遍有效。在西方，天文学上有别于托勒密的哥白尼学说被广为接受；同样，孔子的学说无论作为整体，还是细节，无论在学术界，还是在普通大众的心中，都广受推崇，等同于自然法则。很明显，这样的比较有不足之处，因为时至今日，在美国的一些地方，中小学教师还会按家长的喜好，给学生讲授地球“圆或平”之争；还有人会在公共辩论中公然支持“太阳每日绕地球运行”的学说。先贤所言皆为真理，因此真理皆为先贤所言。中国人认为这两个命题并无出入之处。如今已无圣人，因此中国人的黄金年代只能是在遥远的过去。

这些事实影响深远，与本章论题休戚相关。中国人与历史紧密相连，想要割裂两者势必是徒劳，也是一大禁忌。这已然是不容争辩的事实，是由本能决定的，就像翱翔的猎鹰不会俯冲入水去猎捕可望而不可即的鱼儿一样，或者像鱼儿不会为了躲避天敌铤而走险地游上陆地一样。一千多年前的唐朝，有位国君曾说过一句话，颇为隽永，大意是圣训与民诚如鱼水，圣人与民亦如鱼水，两者相互依存。毕竟，池塘干涸，鱼儿焉存？因此，虽然在中国多数民众并不信仰佛教或道教，但每逢重大礼仪活动，总是会请和尚或者道士

来主持仪式。不难看出,他们在本质上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。如若有人弃儒家于不顾,那么十之八九是由于受到外来学说的深重影响。此时,他便如脱离轨道的小星星,遭人排挤,受人非议。

中国人爱好和平,憎恶战争,由来已久。但一旦身陷囹圄或遭遇外侵,他们势必会群起而斗争。史实表明,中国人骁勇善战,自古以来多是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。虽然如此,在他们眼中,战争并非生活常态,无论他们曾经多么英勇无敌,曾经屡建战功,武官地位始终不如文官。众所周知,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,但是火药并没有被用来延续习俗,统一民众。可以想象,如果中国人好战动武,他们恐怕早已夷平地球了。但事实是,历代中国上至君王,下至百官,恐无一人怀有踏平世界的野心。如遇朝野叛乱,外敌入侵,他们便会集结部队,平敌维稳。然后,一切照旧,恍如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以这么说,中国过去历经战争洗礼,并非为改良现有弊病,而仅仅是为了坚守传统习俗。中国文人历来鄙夷军人,认为他们多数是因为科举不中才弃笔从戎,认为打仗作战都是粗活。的确,武官中身居高位者,目不识丁的不在少数。普通士兵则来自下层社会,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怀才不遇、悲天悯人的厌倦按部就班的家庭生活,急切尝试充满变数却险象环生的生活。因此蠢蠢欲动的他们走进了军营,正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“好男不当兵”。在中国,人们认为军队就是“必要的邪恶”,虽不可或缺,却对其鄙夷有加。他们无意通过主宰军队来革新去弊,这便是他们对军队的看法。考虑先前所述诸多原因,这一看法便不足为奇了。一个多世纪以来,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犯,他们发现自己在武器装备上与别人相去



孔庙,北京



佛教寺庙,北京

甚远，逊色很多。但是，中国人颇为自信，认为如果综合来看，他们仍是中国国民，优势自不待言，非西方蛮夷所能媲美，最后的胜利也自然会归己所有。西方列强逼近，扰乱民众生活，于国于民都是巨大威胁。虽然他们觉得必须对付外敌入侵，但仍然不愿诉诸武力来攘外安内，而是选择隐忍屈尊，任由事态发展。因为中国人始终认为，武力解决争端是下下策。

如果说中国人天生擅长某事，那无疑是生产交易。他们知道物尽其用，清楚何时何地才能将自己的产品卖出最好的价钱。哪怕为了些许酬劳，他们宁愿不厌其烦，饱受劳作与跋涉之苦，历经艰险去兜售自己的物品。他们生来便是优秀的工匠，便是极具天赋的商人。即便如此，中国历来轻商却已成传统。过去，中国社会分为四个阶层，即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商人排在末位。上至朝廷，下至郡县，中国人只要有个一官半职，每每谈及商人，都会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。

洋人最初来华，只是为了通商，贩售商品。由于中国的轻商传统，因此从一开始，中国人对洋人就有鄙夷之意。多年以来，洋人在华数量不多，交易量也微乎其微，可以忽略不计；然而，随着后来交易量与日俱增，洋货开始充斥中国市场，双方获利也随之不断攀升，直至庞不可及。这种情况，无论是中国政府，还是西方商人，都是有利可图的，也实现了双赢。但是，自始至终，中国政府都一如既往地以王者自居，认为是自己屈尊才容忍“蛮夷”来到本国通商，把洋人当成了天朝子民。中国人向来敬畏海洋，虽然他们发明了指南针，也曾经在航海中加以应用，但是他们的舰船陈旧落后，难堪航海之用，这也成了航海史上的笑谈。或许是由于他们的畏海情结，他们很难理解西洋商贩的坚韧，不明白他们为何远渡重洋，一再要求进入中国口岸。对此，能够想象出来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，他们认为洋人出海经商是无奈之举，乃不得已而为之。他们认为，洋人来自地球一隅，那里偏远封闭，民不聊生，而且土地贫瘠，既不产茶，也不产大黄。没有茶叶，如何饮水解渴？没有大黄，如何消化饮食？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。因此，在他们看来，洋人是为了生活才来华经商的，否则他们在中国虽屡次遭到驱逐却仍坚韧折返逗留，就无法解释了。另外，洋人商贩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了“象牙、猿猴和孔雀”等新奇物品和动物，虽价格不菲，却华而不实，而且这些动物还不时地吵闹不止，惹得麻烦不断。因此，中国人觉得通商只是好玩而已，对它也并不十分重视。

在十九世纪初的中国，对金发碧眼的洋人持这种看法的人相当普遍。当时，允许洋人经商的地区有限，当地中国人无一例外都以大清子民自许，清高排外。虽然经历长达一百年的启蒙开化，还有很多忠诚子民认为本国地大物博、雄踞东方，占地球面积的五分之四。国土未及之处，散落在各地，要么是海洋，要么就是英国、法国，或者是回族的领土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全然不知地球上尚有诸多国家。但很快这一情况有所改善，地理知识开始普及，地理课堂甚至开进了衙门，各级官员开始了解世界。他们在“革新”热潮中，热情高涨，从传教士手中大量购进西学书籍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种热潮仅仅持续了一年。

是年,有一位北京本地官员,他能力出众,学识超群,为了启发引导本国学人,刊发了一本精心编写的小册子,供人们传阅。在这本小册子中,他开宗明义,反复提及前人陈见,认为洋人所居之地,人口众多,民生凋敝;洋人来华经商,是天子开恩。他还列举所谓的事实,指出洋人之地人口密度之高,难以想象;民众生活困顿,虽勤勉辛劳,也只能驱豺狼于门外;留守本国洋人少之又少,只能靠天吃饭,聊以度日。我觉得开明的中国老师在教授学生时不会、也不值得提及这些所谓的事实,同样,它们出现在这本小册子中似乎也显得不合时宜,不甚妥当。

直到十九世纪末,西方世界不约而同认识到并且也坦承,对一个国家而言,与外通商势在必行,必不可少,否则国将不国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无数的中国民众仍坚信锁国政策,认为将经商的洋人扫出国门,禁止与外通商,对本国有百益而无一害。这种观点的荒唐自不待言,因为上海通商后已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县府一跃成为远东的商业中心,其曾经不值一文的地产现在价值飙升,堪比伦敦;因为烟台以前只是个无名的渔村,现在已然成为繁华喧嚣的港口城市,把手进入内陆的大门;因为二三十年前的天津还是遍地菜叶垃圾,如今却是北方四省的大都会,是仅次于上海的商业重镇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,业已成为事实,都能雄辩地证明通商为中国带来的改变与革新。那么这一切所为何故?于洋人而言,其目的不言自明;于中国人而言,他们鲜有关注。在中国,任何形式的归纳总结都不奏效,因为中国人总是话外有话,心口不一,外国人几乎不可能捕捉到那话外之“音”。但是,观察审视他们的做法与行为不失为一个良策。如果让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,包括士、农、工、商,通过投票决定洋人去留的话,结果将会怎样?在通商口岸,甚至在其他地区,民众的言行已经给出了清清楚楚的答案,难道不是吗?

这种排外情绪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显露无遗,但是一些人坚持认为这些事件持续时间短,仅仅是孤立的偶发事件。在天津,洋人遭到屠杀,他们将此归咎于暴民的凶残;在镇江,洋人寓所如旋风般地遭到洗劫焚烧,他们认为这只是漕运船民难以管控所致;在宜昌,洋人在口岸遭到突然袭击,伤亡惨重,他们认为这是不听管教的兵丁所为;在福州,民众造反抗敌,他们戏谑民众为“中国的爱尔兰人”,认为他们只是要捣乱,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;在广东,民众排外情绪强烈,时常对洋人发动袭击,造成破坏,他们认为这些不具有代表性,只是长达百年的误解和仇恨所致;在上海,宁波籍的车夫群起反抗,他们则认为这只能说明中国的劳工在罢工中权力过于集中,说明中国地方性的行会有强大的凝聚力而已。

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都是中国通,非常了解中国和中国人。但是如果客观公正地去审视这些观点,它们难免都有牵强附会之嫌,是站不住脚的。好比在某一群岛发现了很多火山,都处在不同的活动阶段,那么无论这些火山是否同时爆发,我们都有理由推测,在不同的火山喷发之间存在着关联。同样,中国四处爆发反洋人运动,其原因可能并不

明显,只能从更深层次去找寻。我们要找的是医生们常说的“易感因素”,而不是“生效因素”。诸多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,原因要逐一解开,但是要揭开事件的真实面纱并非易事,单凭一己之力,可能永远也无法给出至臻完善的诠释。尽管如此,本书将通过接下来的章节做一次尝试,来揭晓义和团运动的来龙去脉。